

# 中国北方地域文化

Zhong Guo Bei Fang Di Yu Wen Hua

徐潜 主编 张克 崔博华 副主编

神秘的中华地理与发现

Shen Mi De Zhong Hua Di Li Yu Fa Xian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 中国北方地域文化



徐潜 / 主编

张克 崔博华 / 副主编

王思博 杨金秀 / 编 著



吉林出版集团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北方地域文化 / 徐潜主编.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472-1482-4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地方文化—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G1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2769 号

书 名 中国北方地域文化

---

主 编 徐 潜

副 主 编 张 克 崔博华

责任编辑 崔博华

装帧设计 DAS 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网 址 [www.jlws.com.cn](http://www.jlws.com.cn)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1482-4

定 价 26.00 元

---

# 序 言

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繁荣，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对既有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普及。该书就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普及而策划的。我们想通过这套图书把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展示出来，让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能够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我们今天振兴民族文化，创新当代文明树立自信心和责任感。

其实，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一样，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综合体”，是一种长期积淀的文明结晶。就像手心和手背一样，我们今天想要的和不想要的都交融在一起。我们想通过这套书，把那些文化中的闪光点凸现出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价值的营养。做好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是每一个发展中的民族首先要正视的一个课题，我们希望这套文库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在这套以知识点为话题的图书中，我们力争做到图文并茂，介绍全面，语言通俗，雅俗共赏。让它可读、可赏、可藏、可赠。吉林文史出版社做书的准则是“使人崇高，使人聪明”，这也是我们做这套书所遵循的。做得不足之处，也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4年2月

## 目 录



---

|        |       |
|--------|-------|
| 一、草原文化 | / 1   |
| 二、关东文化 | / 41  |
| 三、中原文化 | / 79  |
| 四、齐鲁文化 | / 117 |
| 五、赵燕文化 | / 15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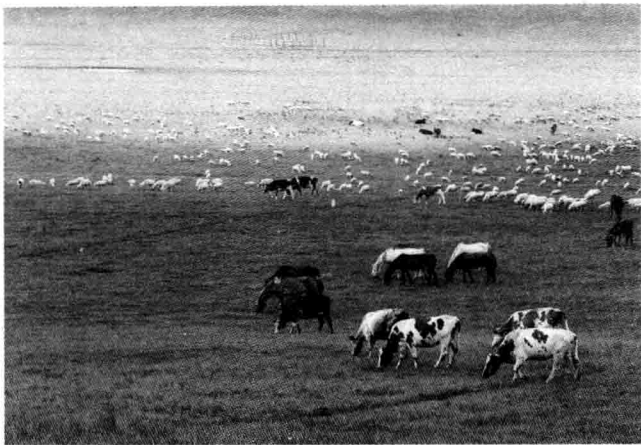
## 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自古以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它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存模式和文化体系，展现了人类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非凡创造力。草原文化并不单纯属于某个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它历经了匈奴、鲜卑、契丹、突厥、女真及元、清、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现已经成为以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文化板块，以多个民族为载体的纵贯整个游牧文明史的文化。

## 一、草原文化的内涵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社会越向前发展，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就越显著。草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这些文化在相互碰撞、融合、再碰撞、再融合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

在我国北方的蒙古草原上，生活着充满活力、刚毅强悍的民族，人称“马



背上的民族”。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繁衍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游牧文明，创造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

“文化”一词内涵丰富，最早源于拉丁文 Culture，译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意义，是人类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后，生活在特定地域的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表现。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在人类社会中越来越彰显其重要作用，人类社会越进步，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显著，人类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创造文化，文化又无时无刻不在完善着人类的生活。历史悠久的草原文化正是这些光辉灿烂文化中的一种。

草原文化是长期生活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与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带有民族特点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节日风俗、文学艺术等具体形式。蒙古族是草原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其主要的载体和传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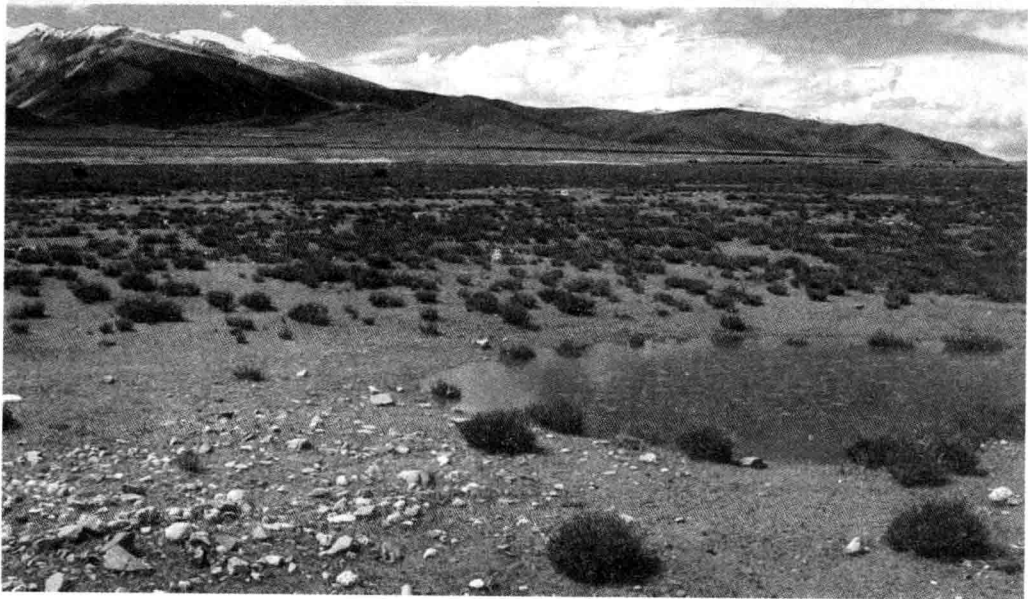
草原文化是以欧亚大陆板块的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是草原上的各民族在长期适应性探索中，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人们以游牧生产为主要生存方式，促成草原民族和草原文化的形成，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它在一段时期内不同程度上也表现为弱势文化、



边缘文化和亚文化，但随着 20 世纪扎赉诺尔的认识和评价后，草原文化得到了广泛认可，这是中国文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草原文化为中国北方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筑就了坚实的屏障，是中国游牧民族的智慧结晶。

草原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富于特色。从类型性模式上划分，如果把黄河文化归为伦理型文化，那么草原文化则属于生态型文化。伦理型文化强调社会道德修养，而生态型文化则主张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秉持与自然和谐相处、永续利用的观点。从历史层面上看，草原是人类祖先的栖息地、许多北方民族的发祥地、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草原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演绎成为以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以游牧文明为主要特质的文化。

草原文化史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实际上是以游牧为主的文化史。游牧文化成为北方草原的主导文化，游牧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其实也是草原文化的发展过程。但是草原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游牧文化，它是具有开放性的文化。草原文化以其自身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与中原文化相互渗透与交融，它从中原农耕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养分，促成了文化的相互交融与统一。另外，草原文化还吸收了古代西域的各游牧民族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草原文化以其开放的心态博采众长，通过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来丰富本民族文化。近现代以来，在各种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下，游牧民族面临着生态







环境退化、草原面积萎缩等自然环境问题，草原人民亦开始寻找一条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发展出路。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生态文化，草原文化仍然保持其自身的文化特质、文化丛乃至文化模式，把文化传承与创新融为一体，并以其内在的生命力在发展本民族文化和适应新的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书写着新的篇章。

由此可见，草原文化不仅包括游牧文化，更是以游牧文化和畜牧文化为核心，兼容狩猎文化、农耕文化和现代工业文化等多元一体的整合形态。





## 二、草原文化的历史渊源

草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是游牧文化，而游牧文化的起源始终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和游牧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游牧生活的流动性、分散性以及文字历史短暂性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

### (一) 草原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

我国的草原文化发祥于原始草原的边缘，大致分布区域为：东以大兴安岭为界，西起阿尔泰山山麓，与青藏高原相通，南至阴山山脉与中原农耕民族相接，北与西伯利亚相连。我国北方牧人在这里生活、繁衍，逐渐形成了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草原文化。

蒙古高原常年被大陆型气候所笼罩，由于地势很高，边缘有山脉阻隔，距海又很远，因而雨量奇缺，气候温差很大，寒暑变化剧烈，冬季寒冷而漫长，夏季苦短而酷热。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不适合从事农耕，只适宜草本植物的生长，因此人们选择了游牧和狩猎的生产方式进行世代的生存和繁衍。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影响，这一地区不仅有广袤的大草原，还有无垠的大沙漠，可大致分为森林草原区、湿润草原区、干草原区和荒漠草原区。有关史书记载：这一带草原地区和沙漠的形成约可上溯到第三纪。在地球历史上，前 350—300 万年一直处于被称为“阿尔卑斯造山运动”的地址变化过程，使塔里木盆地南部一带的内海逐渐收缩，形成了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帕米尔和天山等一系列山脉。随着寒冷和干燥气候不断增强，造山运动把中亚以及蒙古高原的山系





普遍抬高了 600 至 1000 米，越来越干旱的气候发展趋势，使包括蒙古高原在内的中亚地区逐渐变成了草原和沙漠生态占主要地位的自然环境。

气候的变化导致各种植物和动物也适应性地进化和加速发展。草原上的植物多数为高山植物进化为草原与沙漠的植物组合，这些植物最适合在干燥、炎热的气候条件下生长。草原植物类的进化促进了草原动物区系的演化，形成了独特的草原动物群。其中和人类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善于奔跑的有蹄类和地下穴居的啮齿动物。典型的善于奔跑的有蹄类动物有野马、野驴、黄羊、野骆驼等。一望无尽的大草原为这些动物的奔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为了寻找食物、水源和躲避天敌，也要求他们掌握快速奔跑的本领。长期的适应和自然选择使一些草原动物奔跑时速达到 70 公里，使其成为适应草原生活的种群。在《中亚东部的游牧人》一书中明确记载：“公元前，蒙古高原及其相邻的中亚地区不同于其他定居居民的生活区，这里是清晰的原始游牧世界，居住着土著的部落与氏族，牧养绵羊、山羊和牛，牧人的主要职业之一即是饲养马，特别是普尔泽瓦斯基马。这是较早时期就已驯养的一种马，它矮小而壮实，具有异乎寻常的耐力，被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所广泛使用。在戈壁沙漠以南，则畜养少量的驴和骡子，这类马、骆驼、驴的野生先祖，仍见于阿尔卑斯山以东、蒙古戈壁的西南部、准噶尔盆地以及哈萨克斯坦。公元前 700 至公元前 300 年，蒙古高原及中亚其他部分较为发达的游牧生活方式通常被称为中亚游牧方式。”

草原上另外一种食草动物是啮齿动物，这类动物的繁殖能力极强，至今仍然活跃在大草原上，其种类主要有草原黄鼠、呼尔鼠兔、跳鼠、鼯鼠等。它们通过挖洞穴居防御和逃避天敌的袭击，还可以储存粮食和繁殖后代。啮齿动物的天敌是草原上的食肉动物，主要有沙狐、兔孙、艾鼬、伶鼬、旱獭、草原雕和狼。其中，狼是草原上最著名的食肉动物。因此，绿色植物—食草动物—食



肉动物—人类构成了相对稳定的草原生态系统。由于人类处于生态系统金字塔的顶点，所以人类如何利用草原资源成了关键性问题，过度利用会造成草原退化。于是，牧民们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开始了游牧生活。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放牧过的草原及时得到休整恢复，以此来保护草原的自然生态平衡不受到破坏。

## （二）草原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

草原文化已是内蒙古人民乃至全国人民耳熟能详、引以自豪的中华文化之一。人们通过人类祖先留下的蛛丝马迹来努力探寻文化之河的源头，去挖掘草原文化这一千古之谜。

### 1. 蒙古人种的起源

大窑文化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 33 公里处，保合少乡大窑村南。1973 年被发现，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大的石器加工厂。经挖掘，先后出土大量石器，主要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石锤、石球等，其中尤以刮削器、钻具、尖状器等为多。还发现了与人类同时期的其他哺乳动物骨骼化石，有肿骨鹿、真马、啮齿动物、鸵鸟、羚羊、原始牛、赤鹿、披毛犀、虎、古菱齿象等。大窑遗址年代为距今 70 万年至 1 万年前，分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人类发源于黄河流域，由于大窑文化的发现，证明了北方阴山之南也有原始人活动。大窑文化遗址的先民一直过着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定居生活，与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北京人”有着惊人的相似。

河套人遗址：1922 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河岸砂层中发现了一颗八九岁幼童的左上侧门齿化石，一位加拿大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鄂尔多斯牙齿”，后来中国考古学家将其译为“河套人”。齿的大





小与现代人相似，齿冠结构具有原始特征。1956年在该区域又发现顶骨化石一块和股骨一段。经考古鉴定，“河套人”化石年代距今5万至3.5万年，在人类的进化阶段属晚期智人，其体质特征接近于现代人，而门齿和头部化石特征尤与现代蒙古人种十分相近。到目前为止，“河套人”文化遗址共发现人类化石、石器380多件，还有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及鸟类化石。“河套人”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掀起了中国古人类研究的序幕。

扎赉诺尔人遗址：1933年，在内蒙古东北部的扎赉诺尔发现了第一个较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迄今已陆续出土16个，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扎赉诺尔人”。通过对出土文物的鉴定，扎赉诺尔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11400年，属于旧石器晚期或中石器时代。扎赉诺尔是古人类生存的故乡，在一万年以前的中石器时代，他们在这里以狩猎为主，兼事采集，以石刀、石斧、木棒等为耕作工具，成群地栖息在山丘湖畔的草丛密林中，创造了呼伦湖畔早期的原始文化。由此可知，扎赉诺尔人已处于“新人”阶段，属蒙古人种，与北京“山顶洞人”有着很深的渊源。1948年，我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中国史前之研究》中提到“扎赉诺尔文化”一说，指出了中国北方文化起源于扎赉诺尔文化。

## 2. 色彩纷呈的原始文化

进入新石器时代，即距今七八千年前，内蒙古东部地区多处出现相当于此时中原黄河流域的文化聚落。兴隆洼文化遗址、赵宝沟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富河文化遗址、小河沿文化遗址、海生不浪文化遗址和朱开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在新石器时代的蒙古草原，从东部到西部均有人从事定居农业，并有了相当规模的村落组织。朱开沟文化遗址中青铜器的出现，代表着青铜文化的产生，在墓中还殉有猪、羊等动物的下颚骨，这充分说明了蒙古草原开始进入了游牧时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敖汉旗博物馆联合进行文物普查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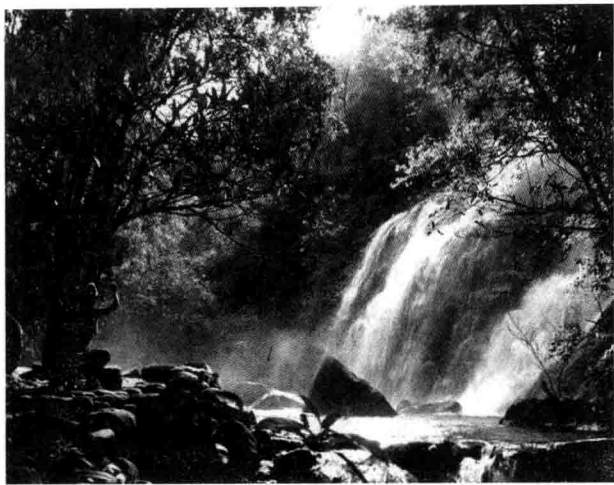
发现了兴隆洼文化遗址，距今已有 7600 多年的历史。该遗址自 2001 年 5 月开始发掘以来，已清理出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房屋遗址 1000 余座，灰坑 30 座。兴隆洼文化遗址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原始“聚落遗址”，对研究原始社会形制和建筑特点提供了直接物据；它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考古界赞誉为“中华远古第一村”。

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约 7000 年，首次发现于敖汉旗高家窝铺乡赵宝沟村，它与兴隆洼文化前后衔接，其原型形成于兴隆洼文化中晚期。遗址总面积约 9 万平方米，已发现的房址和灰坑有 140 余处，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赵宝沟文化石器的主要特点是磨制器与丰富的细石器共存。赵宝沟文化出土的陶器质地多为夹砂陶，陶色为黄褐色，也有红褐色，陶器均为手制，器形较为简单。主要纹饰有拟动物形纹、抽象几何形纹和之字形纹。赵宝沟文化反映了赤峰地区先民的社会结构，为探讨北方农业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

红山文化遗址距今五六千年左右，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在内蒙古境内，主要分布在锡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赤峰市境内和哲里木南部地区，分布面积积达 20 万平方公里。红山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大型碧玉猪首龙最为突出，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中国出土时代最早的龙形玉器，被誉为“天下第一龙”。由于赤峰境内出土了多种龙表玉器，所以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被认为是龙的传人。

富河文化遗址距今五千年左右，现已发掘出的遗址有富河沟门、金龟山和南杨家营子三处。它也是一处聚落遗址，村落分布在河旁的山冈或高地





上，房屋建于朝阳的南坡。富河文化陶器都是夹砂陶，质地疏松，火候不高，陶器表面的颜色为褐色，以黄褐色居多，灰褐色次之。富河文化大型石器绝大多数为打制，形状规整，制作精致，不同的形制，适于不同用途。遗址中的生产工具，锄、铲、凿是最多见的，皆经过精细的加工，富有特色。除了陶器、石器外，还有相当多的骨器。在富河文化遗址的骨器中发现有卜骨，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卜骨，为探讨古代占卜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小河沿文化遗址距今约 3000 年左右，是以敖汉旗小河沿乡白斯朗营子南台地遗址命名的。该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和装饰用品。在陶器的器座上还出现镂空的做法，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精湛的钻孔技术。有些陶器上还发现了原始的图画和文字符号，说明小河沿文化进入了一个更为文明的历史阶段。小河沿文化的先民们从事农业而兼营狩猎业，过着定居的生活，并且开始进入追求和丰富精神生活的时期。

海生不浪文化遗址发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位于县城南 15 公里，中滩乡海生不浪村北 500 米的台地上，背靠山坡，面临黄河，面积约为 15 万平方米。遗址中遗留下来大量的房址、火灶、灰坑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代表了内蒙古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各时期的文化，从中影射出史前家庭性质和家庭形态发展变化的规律。在陶器的彩绘图案上，绘有竹竿、竹叶等装饰图案，说明当时在海生不浪生长有竹子，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土壤、气候、降雨量、气温、空气湿度及地下水位等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海生不浪文化遗址曾被认为是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但经过多次勘察和研究发现该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有别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它是仰韶文化在这一地区的继承和发展。

朱开沟文化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正北的朱开



沟村，1974 年被发现。自 1977 年到 1984 年考古工作者对遗址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面积约 4000 平方米，共发现居住房址 87 座、灰坑 207 个、墓葬 329 座、瓮棺葬 19 座，出土可复原陶器 500 余件，石器、骨器和铜器约 800 余件，为考古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朱开沟遗址中出土了具有地域特点的青铜短剑、铜刀、铜牌饰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与中原商代的剑、刀有明显的差别，与内蒙古东南部夏家店上层文化等中国北方地区的青铜短剑、铜刀、铜牌饰等相似，这就是被后人广为流传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另外，朱开沟遗址的墓葬也很有特点，此时出现了男女合葬墓和男女多人合葬墓。其中合葬墓中死者的社会地位有差别，埋葬的位置也不同，在墓中还殉有猪、羊等动物的下颚骨，殉牲数目不等，这说明了当时这里不仅盛行殉牲习俗，而且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已经不再是氏族社会，而是进入了奴隶社会。

### 3. 充满活力的草原民族

欧亚大草原自远古起就有游牧民族在这里生息繁衍，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满族人、回鹘人和回族人先后称雄蒙古草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别具一格的草原文化。蒙古草原是游牧民族的摇篮，匈奴、鲜卑、契丹、满族、回鹘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民族，他们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时代，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在经济方式、人口构成、语言文字和心理素质、民间风俗等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 (1) 勇敢善战的匈奴人

匈奴是第一个统一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一提起匈奴，就会使人把它和战争、暴力、流血联系起来。的确，匈奴是个崇尚武力的民族，在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前 5 世纪，他们通过战争曾震撼东西方。通过武力，匈奴人在东方兼并了周边民族，形成了一个东起辽河、西越葱岭、北达贝加尔湖、南抵长城的强大草原帝国。匈奴人建立了草原帝国，打通了东西方壁垒，通过和平交流和暴力冲突的方式，与其他民族文化彼此影







响，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使草原文化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匈奴势力最盛时大约是秦末汉初，后来由于天灾人祸和汉军的打击，匈奴势力逐渐衰退。汉代匈奴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分裂：一次是公元前57年左右出现的五单于并立局面，最终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53年归汉，引众南徙阳山附近；另一次是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日逐王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袭用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匈奴由此分裂成南北二部，南下附汉的称为南匈奴，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西晋时，南匈奴人逐步转向定居农耕生活。他们仍然聚族而居，社会结构上基本没有变化，只是在生活习惯和文化教养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和改变。304年，刘渊建立政权，民族共同体开始瓦解，并逐渐汉化。北匈奴战败后部分西迁，归附于新兴起的鲜卑。

## (2) 勇于开拓的鲜卑人

鲜卑本为东胡部落的一支，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鲜卑起源于辽东塞外鲜卑山，由此命为族名，后主要活动于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旗哈古勒河附近（今内蒙古通辽市），从此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对鲜卑民族具有突出贡献的首领要数檀石槐，他不仅统一了鲜卑诸部、建立了军事部联盟，而且还任用汉人，实行汉化，从而促进了鲜卑社会的发展。檀石槐死后，联盟瓦解，各部落附属汉魏。而后，内迁的鲜卑慕容氏曾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乞伏氏建立西秦；秃发氏建立南凉。248年，拓跋氏以盛乐为中心建立了部落大联盟，为建立“代”政权和“北魏”王朝奠定了基础。312年，拓跋之孙猗卢称代王，猗卢死后什翼犍被推举为代王，统治了39年之久。什翼犍死后，国家分裂成东西两部，东部由刘库任统辖，西部由卫辰统辖。刘库任死后，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为魏王，标志着北魏的建立。拓跋珪征服了周边其他的部落，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鲜卑族。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比较稳定的封建王朝。拓跋珪